



世界偉大文化名人

——一九五四年紀念——

新知識出版社

世界偉大文化名人

——一九五四年紀念——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上海

世界偉大文化名人

——一九五四年紀念——

*

新知識出版社編輯室出版

(上海湖南路九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一五號

上海新力印刷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新 0180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 3/8 字數：24,000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4,300 本

定價：(6類) 0.16 元

編者的話

一九五一年，世界和平理事會發起紀念世界偉大文化名人以來，這種重大的文化活動，已獲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密切注意和熱烈支持。紀念世界文化遺產的偉大代表，不僅有助於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聯系，且能促進彼此了解和鞏固和平合作。

本書介紹了世界各國人民在一九五四年所共同紀念的英國現實主義作家菲爾丁、俄羅斯現實主義作家契訶夫、捷克斯洛伐克作曲家德沃夏克、希臘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等四位文化名人的生平事蹟，以供讀者參考。

一九五五年七月

目 錄

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菲爾丁·····	蕭 乾(1)
紀念偉大的俄羅斯現實主義作家安東·契訶夫 ·····	何家槐(10)
捷克斯洛伐克偉大的作曲家安托寧·德沃夏克 ·····	黃賢度(22)
阿里斯托芬——熱愛祖國的偉大喜劇作家·····	李真吾(28)

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菲爾丁

——紀念菲爾丁逝世二百周年

蕭 乾

英國十八世紀的偉大現實主義作家亨利·菲爾丁是世界和平理事會一九五四年號召全世界人民紀念的國際四大文化名人之一。他在二百年前的十月八日，客死在葡萄牙京城里斯本。

在他活着的短短四十七年中間，他編寫了二十幾個劇本，辦過四個刊物，創作了四部長篇小說。蕭伯納認為除去莎士比亞，菲爾丁是中世紀到十九世紀間英國最偉大的戲劇家。詩人拜倫把他的小說比作“散文中的荷馬”。兩百年來他的作品一直為全世界廣大羣衆所熱愛，受到歌德、斯湯達、別林斯基



亨利·菲爾丁像

和高爾基等偉大作家的熱烈推崇，並且被馬克思列為他生平

最喜愛的讀物之一。他是英國啓蒙現實主義的一把火炬、一面光輝燦爛的旗幟。這一切，都是由於非爾丁忠實於人生，嚴肅地對待他的創作事業。他的作品所以流傳不朽，是因為它們寫得真實，而這和他那熱愛人民，嫉惡如仇的戰鬥的人生觀是分不開的。

一 戰鬥的一生

非爾丁生活在英國工業革命的前夕，正是英國新興資產階級爲了擴張它的聲勢，對內無情地剝削着本國勞動人民，對外積極掠奪殖民地的時期。他出生的時候（一七〇七年），英國統治階級爲了和法蘭西爭奪歐洲的霸權，已經一連打了十年仗。他創作的主要時期（十八世紀中葉），正是英國在大陸上爲了奧地利女王繼位問題，在美洲和印度爲了跟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爭奪殖民地，不斷地東征西討。這些戰爭使得英國老百姓貧困不堪，而金融資本家、工廠老闆們則像雪球般越滾越富。

在這個貧富懸殊的社會裏，“公道”自然是完全掌握在地主和資產階級手裏。當時英國監獄裏關的囚犯人數比全歐洲的還要多，老百姓爲飢寒所迫偷上五個先令就處死刑，而權貴豪門則公開貪污舞弊。新堡貴族管“競選”叫替他餵養的畜牲找草地，惠格黨內閣的首相倭爾普公開承認國會裏每個議員頭上都各有個“價碼”——就是他們在賄選時所耗用的錢數。

這些寄生蟲從人民身上刮到了錢，就去酗酒、聚賭、玩女人、過荒淫無恥的生活。

非爾丁出生在一個破落的貴族家庭裏，因而他既有機會

看到本階級的腐爛，又嚐到貧窮的滋味。他在貴族的伊頓學堂上學時，家境還勉強過得去。一七二八年他赴荷蘭雷頓大學去留學時，景況困難得只好中途退學。轉年他就面臨“當一個傭傭的馬車伕或是當一個傭傭的作家”的選擇。

從一七二九年，他便依靠寫作來生活了。他首先從事的是戲劇。他早期有一個劇本寫一個新作家的掙扎，題目是“作家的鬧劇”。主人公“倒霉先生”是個到處碰壁的作家。他的劇本找不到主顧，房租交不上，房東太太就插了腰對他說：“倒霉先生，你不要再拿你的劇本來搪塞了。一個沒有上演的劇本的價值不比一張沒有搖過的彩票價值大。我哪裏料到會招上一個詩人當房客！……你搬去以後，我一定用紅字在門上寫着：‘詩人概不出租’！”戲裏還寫到他和劇場經理等的鬥爭，這些多少使我們聯想到非爾丁寫作初期的艱苦。

所有他的劇本都類乎諷刺笑劇，都是針對當時社會上的浮誇虛偽、政界裏貪污賄選等黑幕進行尖銳而有力的抨擊。“唐·吉訶德在英國”（一七三四年）和“巴斯崑”都盡情地暴露了政客賄選的醜態。在“歷史日曆”（一七三七年）一劇中，有一景描寫拍賣。在逼真的情景下，拍賣的物件却是“一件不經見的衣料零頭——政治上的誠實，担保足夠政客們作一件很好的外衣，裏外可穿，兩面隨時都可以調換。”（有人出價五鎊買去了。）另外一件適合郡選舉時穿用的“時髦的愛國主義”找不到買主。一顆先後由法官和主教用過的良心也沒人肯出價錢。最後以一個先令成交。

這些辛辣的諷刺大大觸怒了統治者。一七三七年五月間，

政府機關報就警告他不許在舞台上議論政治。幾天後，非爾丁索性把兩個寫得最尖銳的劇本印成一個小冊子，前面寫了一篇“給公衆的獻詞”說：“如果天賦給我一些嘲諷罪惡和欺詐的才能，只要我們的出版和演出的自由還存在一天，我就一定不會偷懶，就一定毫不懼怕地去發揮那份才能。”

次日，扼殺非爾丁戲劇寫作前途的“檢查法”就在國會通過了，它規定一切劇本上演前都必須先送審，否則課五十鎊罰金。在上院辯論時，柴斯特斐爾貴族明白指出這個法令的真正起因是非爾丁的那些攻訐政府黑幕的劇本。這法令引起了英國人民的公憤。當第一個被官方批准的戲在修道院花園上演時，羣衆集合起來抗議，劇院門前是一片騷動。

失掉舞台這個陣地後，非爾丁跟朋友合辦了一個“戰士”雜誌，改用雜文向黑暗勢力進攻。同時，他在上面發表的一些關於鄉紳、牧師、城裏的時髦仕女、流氓律師以及受冷的妻子等人物速寫都剛好成爲他寫小說的準備。

這時期，他還學習並操過律師業。法律（包括監獄中的黑幕）在非爾丁的小說中佔很重要的地位。通過這個職業，他更細膩、更深刻地觀察了社會生活。

一七四二年，他的第一部小說“約瑟·安德魯”出版了。非爾丁一向很喜愛“唐·吉珂德傳”，這部小說的副標題上寫着“擬賽萬提斯而作”。同時，他在書中還企圖嘲諷李查德孫在一七四〇年出版的小說“帕米拉”，實際上他的成就却遠遠超出這些。他筆下的亞當姆斯牧師那個令人難忘的形象絕不是脫胎於西班牙騎士，而是個土生土長的英國人。

轉年，他出版了一部“雜集”，其中包括他的寓言小說“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在這部政治諷刺作品中，菲爾丁的筆鋒抨擊的是古今憑暴力統治人類的“偉人”。

一七四九年，他的傑作“湯姆·瓊斯”出版了。這是英國小說史上劃時代的作品。它通過一個棄兒的身世替十八世紀中葉的英國繪了一幅生動的縮影。這部“散文滑稽史詩”立刻受到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出版商竟至來不及裝訂，書在散頁狀態下就銷光了。

他最後一部小說“亞米麗亞”(一七五一年)更集中地暴露了英國司法界的黑幕，但是它缺乏“湯姆·瓊斯”的明朗、樂觀氣氛。從一七四八年，菲爾丁爲了一年三百鎊的薪俸——他自己說，那是“世界上最骯髒的錢”，——當了西敏寺區的治安法官。這個職位使他整天和倫敦的兇犯、強盜打交道，使他對“人性”開始感到絕望。

菲爾丁年輕時候體格本來很健壯，但是由於貧困和操勞過度，他連得了氣喘、黃疸和癰脹等症。一七五四年夏天，他的病症嚴重起來。於是，他遵照醫生囑咐去葡萄牙休養。途中，他還寫了一部“里斯本航海日記”。

到了里斯本不久，他就結束了他的緊張的戰鬥的一生。

二 他擁護什麼，反對什麼

菲爾丁在論諷刺時，說天下有三種東西不宜嘲諷：一是真正善良的行爲——那應使我們肅然起敬；二是各種罪惡——僅僅諷刺它們還不够，應該深惡痛絕；三是生活中的困苦遭

權——那諷刺不得，應當寄以同情。可見非爾丁對他擁護什麼、反對什麼是有着清醒、鮮明的見解的。

在非爾丁的作品中，我們處處可以看到他對受壓迫受損害者的同情，——尤其是他們在法律面前遭到的歧視，和對壓迫者的切齒痛恨。在劇本“唐·吉訶德在英國”中，一個人物說：“在所有國家裏，監獄都只是給窮人住的。一個窮人偷了上流人五個先令就得坐牢，可是上流人搶起窮人來成千成百，他們却安然坐在家裏。”在劇本“巴斯崑”中，一個人物嘲諷說：“人們爲了做壞事而受處罰，然而上流人受不到處罰，因此他們從來是不做壞事的。”

在小說中，他時常寫到冤獄，如“湯姆·瓊斯”裏一個人被控偷馬。法官不給他辯護的機會，還魔鬼般地呲了牙說：“哦，你的運氣比你想的還要好些，你不但找到了一匹馬，還找到一根絞繩。”“大偉人傳”和“亞米麗亞”中都幢幢地籠罩着牢獄的黑影。他把衙吏比做屠戶，把拘捕狀比做屠刀，它宰割的是人身自由。

非爾丁最痛恨的是騎在人民身上作威作福的權貴。在“大偉人傳”裏，他說那些統治者的行徑比盜賊還兇惡。比妓院老鴇還沒廉恥。在同書中，他把人類分做用自己的手來創造果實的，和那些坐享其成的。在“戰士”雜誌裏他寫道：“如果他們有利可圖的話，把一半同胞的腦袋割掉他們也幹得出的。”“約瑟·安德魯”裏就敘述過一個扒起自己衣袋的人。這些都說明非爾丁對於損人利己的剝削行爲是極端憎恨的。

在認識上，非爾丁對這些罪惡的來源和解決的辦法都還

不透徹，譬如他晚年在一個小冊子裏竟把貧窮和執法不嚴下列爲倫敦盜風熾盛的原因。然而我們可以肯定說：他對那些受壓迫的人們是同情的，這種同情使他貼近生活，使他的作品接近現實的本質。

在創作道路上，非爾丁是堅持從生活出發的。在“約瑟·安德魯”的序文中，他聲明“書裏沒有一個人物或動作不是經過我的觀察和體會的。”但是非爾丁也不贊成對現實不加提煉，“有聞必錄”式的寫法。他總是把一個作家應當親自體驗和他對事物的判斷，以及對細節的選擇同時提出來的。

“湯姆·瓊斯”共分爲十八卷，每卷前面都有一篇序文，非爾丁通過它們發揮他對文藝和人生的見解。在第九卷的序文中，他提出作家應具備的四個條件是：一、天才。他認爲那是“能迅速而明智地深入到事物的真實本質。能够發掘並分析事物的力量。”二、學問——指文學修養。他相信這種修養不但不會使一個作家的才能受到束縛，並且還能使他的工具更加銳利。三、“和各種行當，各個階層的男女接觸”，從而對“人性”取得健全的知識。四、同情心。關於這一點，他說：“大部分哀淒動人的景色都是揮着淚寫出的。寫滑稽作品也是一樣。如果我不是先讀者而笑，我就永遠不能使讀者大笑起來。”他指的是感情的真實。

在這四個條件中，他最常談的是和人的接觸。在同書第十三卷的序文中他向“經驗”呼籲說：“讓我和那些明智、善良和高尚的人們多多往來，然而不僅是他們，而是各色各樣的人物：從大臣到衙吏，從公爵夫人到女酒保。只有從你（經驗）那

裏我才能了解人類的姿態。”他還祈求就：“引導我經滯自然（指生活本身）中的一切迷津，一切曲巷幽徑，把俗眼看不見的一切隱秘傳授給我，使我了解人類多於他們了解自己。”

在真實生活中間去熟悉生活和人物——這正是非爾丁創作哲學的出發點，也是他的作品所以能吸引讀者的原因。他對十八世紀英國的城市和鄉村、上層和下層社會同樣熟稔。“湯姆·瓊斯”裏有四十多個人物出現，從貴族、縉紳到屠閹人和馬車夫。湯姆和布力非同是孩子，既可敬和魏思頓同是縉紳，夏楚和方正同是塾師。然而他們並不因為身分相同而在輪廓上顯得模糊，他們都是有着不同的相貌、脾氣和習慣的具體的人。我們時而替湯姆擔憂，時而替他慶幸，也正因為他在讀者心目中已經成為一個有血有肉，脈搏能動，鼻子能冒氣的活人。“浮華世界”的作者薩克雷稱讚非爾丁的人物說：“我們直像上午剛同他們一道吃過早飯，或者下午將同他們在公園見面一樣。”這是由於他的人物是從生活中塑造出來的，它們自然也可以跳出書本，再回到生活中去。

從藝術上看，他臨終寫成的“里斯本航海日記”並不是他的傑作，然而它却是一個偉大心靈的珍貴而動人的記錄。它不但生動地說明了非爾丁對寫作是怎樣勤勞不倦，甚至在病篤時刻還不肯放下筆。從這本遊記的內容我們還可以感到他對生活、對人類的那種熾熱的、執拗的感情。動身之前，當他和兒女們吻別時，他清醒地意識到死亡的逼近。他的癰眼已經嚴重得使水手們在他登船當兒笑出聲來。他嚴峻地責備他們不該那麼缺乏同情。坐在甲板上欣賞着映在落日餘暉下的祖國景

物。他那種依戀不捨的心情活現在紙上。他一路向沿海漁民打聽着各種魚的價錢，跟船主熱烈地攀談着他航海四十六年來的經驗。在病魔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脅下，他對周圍一切，特別對於人，依然感到濃厚的興趣。

菲爾丁一生在文學上輝煌的成就恰好說明：只有當一個作家在胸膛裏燃燒起對人民的愛，他才能熱愛生活，才能寫出真實感人的作品。

（原載一九五四年十月八日“人民日報”）

紀念偉大的俄羅斯現實主義作家

安東·契訶夫

何 家 槐



安東·契訶夫像

安東·巴夫洛維奇·契訶夫一九〇四年七月十五日在德國的巴登維勞逝世，一九五四年正是他逝世的五十周年。

這位偉大的俄國十九世紀現實主義作家，出生於一八六〇年，他的故鄉是亞速海邊的大岡羅格。他的祖父是一個農奴，在他九歲的時候才用錢贖出來，使他們的一家人獲得自由，因此他曾經說他的

血管裏是流着農奴的血的。他的父親是一個雜貨商人。但在他十六歲那年，他的父親就破產了，以致他沒有念完中學，就要獨立謀生，繳付自己的學費和貼補一家的費用。

一八七六年，他的全家移居到莫斯科去；不久他自己也進

了莫斯科大學的醫學院。一八八〇年，他就開始以“安多沙·契洪特”這一個筆名在“蜻蜓”、“斷片”和“鬧鐘”等等幽默刊物上發表文章。

他的作品一出現，就引起了讀者的注意和愛好。

很多資產階級的傳記家和評論家，以爲契訶夫從他在“新時代”上發表文章以後才開始認真創作，他的作品才漸漸地顯出特色；他自己也以爲他在八十年代前七八年所寫的一些東西不過是些“小笑話”，小故事，並不是什麼用心寫出來的作品。其實是並不盡然的，因爲就是這些“小笑話”或小故事，也有豐富的思想內容和生動的藝術形象，決不只是一些簡單的笑料。魯迅先生曾經介紹過他這一時期的八個短篇（都收在“壞孩子和別的奇聞”裏面），並在“前記”中說了這樣深刻而中肯的話：

“這些短篇，雖作者自以爲‘小笑話’，但和中國普通之所謂‘趣聞’，却又截然兩樣的。牠不是簡單的只招人笑。——讀自然往往會笑，不過笑後總還剩下些什麼，——就是問題。生齒的化裝，蹩腳的跳舞，那模樣不免使人笑，而笑時也知道：這可笑是因爲他有病。這病能醫不能醫。這八篇裏面，我以爲沒有一篇是可以一笑就了的。但作者自己却將這些指爲‘小笑話’，我想，這也許是因爲他謙虛，或者後來更加深廣，更加嚴肅了。”

這話是一點也不錯的。魯迅先生所譯的“波斯勸章”（作於一八八七年，內容是暴露沙俄時代的官僚的）曾經遭到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禁忌，不許發表，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契訶夫是生長在俄國歷史的過渡時期中，那正是俄國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的前夜。這個時期（特別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一方面沙皇的極端反動，是人民的極端貧困，是政治生活的極端停滯，一方面又是俄國革命運動的逐漸成熟，是科學和藝術的日益豐富；因而列寧既把八十年代比喻為監獄，同時卻又指出這是一個思想和理性到來的時代。由此可見，這個時代的情形是很複雜的，一般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往往為一些表面的社會現象所迷惑，辨不清方向，找不到出路，既不能發現矛盾的本質，更不懂得解決矛盾和克服矛盾的方法，因而苦悶、彷徨、頹廢、消沉，他們的思想非常的混亂，他們的生活也是非常的空虛；那些為民粹派的花言巧語所麻醉了的知識分子，更表現得萎靡不振和墮落不堪。

這些可憐而又可笑的知識分子，正是契訶夫嘲笑和鞭打的主要對象。在他那些卓越的作品中，他辛辣地諷刺了他們的軟弱無用和庸俗無聊，揭發了他們的虛偽和卑劣；同時，他更無情地指出了這些知識分子的階級本質，暴露了當時俄國社會制度的各種罪惡。因此，雖然契訶夫和革命運動距離很遠，沒有直接參加當時的政治生活，但是他的作品却真實地表現了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歷史，生動地反映了那一個時期的俄國社會。所以能够這樣，就是由於契訶夫的生活經驗非常豐富，對於社會的弊病觀察得非常深刻，十分善於透過表面的現象發現事物的真相，發掘矛盾的本質；由於契訶夫不但是一個很有才華的現實主義作家，而且是一個熱愛人民和祖國，熱愛光明和真理，富有正義感的偉大的民主主義者。